

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

刘纳 著

CHUANGZHAOSHE YU TAIDONG TUSHUJU

广西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 韦玮 陆宁芳
封面设计 梁伟琪

ISBN 7-5435-2921-1



9 787543 529212 >

ISBN 7-5435-2921-1/G·2209 定价:20.00 元

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

刘 纳

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

刘 纳 著

☆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鲤湾路8号

邮政编码:530022 电话:5850219

本社网址 <http://www.gep.com.cn>

读者电子信箱 master@gep.com.cn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区计委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7.75 印张 插页 4 152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 7-5435-2921-1/G·2209 定价: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 言

10年前,“五四”70周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论文《五四新文学的实绩与光影》(《上海文论》1989年6期)。当时,不但贫瘠实绩与庞大光影之间的反差已经使我备感困惑,而且,我感到历史与文学史的行进隐藏着诸多秘密,在我们以往所知道的文学史诸成因以外,可能还存在着另一些不该被忽视的因素。例如,为什么“五四”之后新文学的发展历史几乎成为一部社团运动史?其间的一次次论争以及论争背后的是非恩怨似乎在“五四”时期都能寻出缘由。当时,我只是含糊地说到:“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切都是从‘五四’开始的……连文人圈子之间的流派之辩与意气之争也是从‘五四’开始的。”

我从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识“五四”文学传统》(《上海文学》1993年4期)得到很多启发。

这本《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本来只是希望按照主编的意图,以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的合作,探讨文学社团与出版社的关系。但进入这个题目之后,所引发的问题就不仅限于“出版”了。从社团与出

版引发开去,我们可以从更多的角度去理解“五四”新文学以及“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

在“五四”新文学开始自己的发展道路尚不久的时候,缺乏背景与关系的创造社人已经敏锐地观察与感受到:“我们只要任意把社会的任意一角拿来查看,就可以知道他是政局的忠实的缩写。我们的文学界又安得不是一个政界的舞台?”(成仿吾《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他们集中攻击对立派“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劣的政客者流不相上下”(郁达夫《艺文私见》)。这些说法虽偏激而夸张,却犀利地道出了“五四”之后新文坛真实存在的情况。

当然,创造社人鄙视以政客的手段用于文坛,而他们自己在以“打架”实现“异军苍头突起”的过程中却也并不拒绝使用如“党同伐异”等类似的手段。或许,这是出于对“文坛上生存竞争非常险恶”(郁达夫《友情与胃病》)的体认。

2

就在《新青年》为文学革命发难,而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文学社团陆续登场的“五四”时期,中国政治舞台上正演出着乱哄哄的闹剧。自1916年袁世凯死后,走马灯似的换了好几个大总统,南北军阀各据一方,北洋军阀内部派系倾轧,1920年有直皖战争,1922年有第一次直奉战争。国会里,有“宪政商榷会”和“宪法研究会”的吵吵嚷嚷,有安福俱乐部操纵选举,有臭名昭著的五千银元一票的“猪仔议员”。流品日滥的各类人物走马灯似的上台表演,纠纠武夫们翻云覆雨、拥兵自重,欺世盗名的政客们则播弄权谋、招摇蛊惑、舞智弄巧。“五四”新文学作家对现实政治无不十分厌恶,如郁达夫所说:“现代中国的腐败的政治实际,与无聊的政党偏见,是我们所不能言亦不屑言的。”(《创造日宣言》)但是,由于“五四”新文学并非开始于自发的个人写作,《新青年》发难过程中的策略性与战斗性已经显示

出新文学先驱对政治行为方式的参照和对集体力量的倚重。由于“五四”新文学一开始就出现了以非文学人物而为文学革命发难的“奇妙”(郭沫若语)现象,厌恶现实政治的新文学人物们又不约而同地将文学界视作了“一个政界的舞台”。

鲁迅写道:“教育界的称为清高,本是粉饰之谈,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一样……况且又有这样的环境,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坏,体中的一部分决不能独保健康一样,教育界也不会在这样的民国里特别清高的。”(《两地书》)同样,文学界也难以“特别清高”。

值得注意的是文学人物对“势力”的关注。

“势力”本属大则政治家卑则政客所运筹谋划的事情。《毛泽东选集》第一篇文章便开宗明义地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分清敌我,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这是一切革命的、非革命的政治家设谋定策的核心。而当文学人物也须动这份脑筋,文学界“安得不是一个政界的舞台”?

作为个人性质的文学写作,本与“势力”无关无缘,因而,文学作家无不明晰地知道与“势力”相关联的心思不够冠冕,于是,人们也就难看到他们对“势力”的堂正的谈论,所读到的无非是指斥他人对“势力”的热衷,涉及自身时,通常是表白自己对树立个人势力并不感兴趣,可取之而不取。

1925年,郭沫若曾收到武昌师范大学的聘书,请其做文学系主任,郭沫若后来回忆这件事时,写下了一段意味深长的文字:

武大出身的洪为法,当时是常在和我通信的,他的劝法尤其直率。他说,要在中国文化界树立一势力,有入教育界的必要。

中国人是封建思想的结晶，只要正式地上过你一点钟的课便结下了师生关系，他便要拥戴你，称你为导师，而自称为弟子。如仅是著书立说，不怕尽有人深切地受了你的教益，也是讳莫如深的。一会儿要和你道弟称兄，一会儿还要骂得你涅槃出世。这真是不合算的。他这番话，倒的确也道破了一部分的真实。然而你在文化界就算树立了一个势力，又怎么样呢？（《创造十年》）

4 | 可以肯定，不少新文学作家都掂量、考虑过“势力”问题。大学确是个树立势力的好地方。在中国，师生这一层关系虽置于“五伦”以外，却尤为文人所看重。在尊师的优良传统中，其实始终包含着师生之间互相利用的实际需要：学生需要老师的提携，老师需要学生的拥戴。科举制度下老师的“传道、授业、解惑”，通常是给学生指引做官之路的阶梯，而后，同在官场的师生、同门、同年之间便可能在利益需要的前提下形成帮派、造成势力。及至科举废了，学校兴了，民国建立了，新文学运动发生了，个性解放的旗帜树起来了，师生这一层关系并没有也不可能变得完全纯洁。教师不但有指教点拨之责，而且通常还承负着引荐名人、推荐稿件以至介绍工作等分外之职。做学生的也不尽是“大树底下好乘凉”，作为受恩者，他们须在老师需要时充当捧场与附从的角色，于是便会出现鲁迅所说“废名是他（周作人）荐为大学讲师的，所以无怪攻击我，狗能不为其主人吠乎”（《致许广平》）这样的事。也因为见过诸如此类的事，鲁迅曾对想拜其为师的青年说，“约为师弟的风气，我也不赞成”，“我们的关系，我想，只要大家都算在文学界上做点事的也就够了”（《致杜和銓、陈佩骥》）。

是的，“只要大家都算在文学界上做点事的也就够了”。但是，对

于完全与势力无关的作者来说,想“在文学界做点事”又谈何容易?作为作者,首先遇到的便是作品发表和出版的问题,因而,出版机关便被视为比大学更能造成势力的地方。1921年春天,当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负责人高梦旦力劝胡适“辞去北京大学的事,到商务印书馆去办编译所”,胡适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的感想和态度:“此事的重要,我是承认的: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但我是30岁的人,我还有我自己的事业要做……”是年夏天,胡适到上海考察了商务印书馆,他又感慨万分地写道:“这个编译所确是很要紧的一个教育机关——一种教育大势力。”

至于鲁迅后来所说《新青年》的同人中,“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守常全集〉题记》)则甚至可以视为正常的事了。

说起“五四”新文学,谁都会想到它以个性解放为旗帜。茅盾后来说:“人的发见,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关于“创作”》)实现生命价值观的改变,这一点对于文学写作者来说,无疑比对社会上从事其他职业的人要重要得多。“五四”作家无不具有清醒的、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自主意识,“发挥个性,表现自己”(冰心《文艺丛谈》)成为许多作者的文学信条。然而,在周围满是敌意的现实社会里,站在“新”的一面的人们又无不深切地感受到个人力量的单薄和脆弱,因而,他们结合成社团,依靠集体的力量去实现个性和表现个性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从《新青年》的时代起,提倡新文化、新文学的人们便把文学视为战斗,将刊物视为阵地,将政治斗争的方式施用于文学,这一经验被当做宝贵的财富由热情结社的文学青年们继承了下来,《新青年》同人刊物的性质也为文学青年结社提供了参照。

鲁迅 1930 年对新文学社团的描述显示了他犀利的眼光：

……每一个文学团体中，大抵总有一套文学的人物。至少，是一个诗人，一个小说家，还有一个尽职于宣传本团体的光荣和功绩的批评家。这些团体，都说是志在改革，向旧的堡垒取攻势的，然而还在中途，就在旧的堡垒之下纷纷自己扭打起来，扭得大家乏力了，这才放开了手，因为这不过是‘扭’而已矣，所以大创是没有的，仅仅喘着气。一面喘着气，一面各自以为胜利，唱着凯歌。旧堡垒上简直无须守兵，只要袖手俯首，看这些新的敌人自己所唱的喜剧就够。（《我们要批评家》）

6

“五四”新文坛飘扬着自由的旗帜，新文学作者们本是为了争取写作与发表的自由而集结成社团的，但是，在因此而争得了一部分自由的同时又难免使自由——包括他们最为珍视的心灵自由——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由此联想到“五四”以后走向集体主义、朝向左翼的作家往往是怀着对自由的热烈憧憬才做出这样的政治选择的，而后他们的文学追求却集体地被牵引着按照某个特定的方向展开，反而让一些对自由的渴望原本没有他们强烈的人落下了“自由主义作家”的徽号，我们或许会对贯穿中国现代文学 30 年的运动、论争以及写作的个人性/集体性多一些认识。

“社团与刊物”丛书的创意为我们提供了介入文学史现象的新视角，由此会引发对以往文学史较少关注的诸多方面的思考。因而，本书的写作中的“跑题”也就成了不必辩解的事。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结社计划的搁置与“复活”	(1)
1. 创造社的“受胎期”:办杂志的设想	(1)
2. 投稿遭拒的经历	(4)
3. 作者与编辑:郭沫若与宗白华	(9)
4. 作者与编辑:郭沫若与李石岑	(26)
5. 结社计划的“复活”	(33)
第二章 成立社团的关键:找出版社	(35)
1. 寄希望于田汉	(35)
2. “钉成一个小册子传阅”的 计划	(39)
3. 上海滩的大书局“不 能 办 ”	(42)
4. 筹划中的创造社不 能 办 研究会 那样 恰 好 有个现成的 刊物可供利用	(47)

第三章 泰东图书局和它的经理赵南公	(55)
1. 郭沫若与成仿吾:前途莫测的归国之行	(55)
2. 赵南公决心“重建理想的新泰东”	(57)
3. 泰东图书局两种冠以“新”字的杂志	(63)
4. 赵南公手下的三员干将	(68)
5. 趋新,却往往“新”不到点上	(72)
第四章 郭沫若与赵南公:最初的合作	(79)
1. 在赵南公看来,郭沫若的“商品价值还不坏”	(79)
2. 郭沫若:一个半月做了三件事	(81)
3. 郭沫若:不平与怨怒自此开始积累	(97)
第五章 郭沫若与赵南公:再次合作	(101)
1. 两项工作的进行:丛书与杂志	(101)
2. 缺少明确“说法”的合作关系	(104)
3. 郭沫若不能对商务印书馆这庞大的存在无动于衷	(111)
第六章 “打架”,“杀开了一条血路”	(122)
1. 锋芒毕露的亮相	(122)
2. “战斗”的榜样:向垄断文坛者发难	(127)
3. 为什么挑起“打架”	(133)
4. 论争的“四个回合”与“主义”的分歧	(142)
5. 四面出击,多方树敌	(157)
6. 从一个文学青年的领悟看办刊策略	(162)

7. “打架”与创作	(172)
8. 从“打架”到“阶级斗争”	(184)
第七章 三年的“创造”历程	(190)
1. 从《创造》季刊的出版到“创造”事业进入鼎盛期	(190)
2. 困窘的“笼城生活”	(195)
3. 从“人办杂志”到“杂志办人”	(205)
4. “失掉了效用的泰东便只留下了苛刻”	(213)
5. 赵南公毕竟为创造社提供了摇篮	(220)
第八章 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决裂之后	(224)
1. 不愉快的尾声	(224)
2. 《洪水》的复活和创造社出版部的成立	(228)

第一章 结社计划的搁置与“复活”

1

1. 创造社的“受胎期”：办杂志的设想

日后研究“五四”新文学的人都不能绕过郭沫若——无论怎样评估他的诗和他这个人。然而，在1918年8月，作为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相当于高中）学生的郭沫若，尚与1917年已经发生的新文学运动毫无关系，“国内的新闻杂志少有机会看见，而且也可以说是不屑于看的”^①。

1932年，郭沫若在回顾创造社发展历程的《创造十年》里首先提到了1918年8月下旬他与同学张资平的一次谈话，他们对《新青年》

^① 郭沫若《创造十年》，《学生时代》3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并不怎么佩服：

“中国真没有一部可读的杂志。”

“(《新青年》)还差强人意，但都是一些启蒙的普通文章，一篇文字的密圈胖点和字数比较起来还要多。”

“……你看《新青年》那样浅薄的杂志，不已经很受欢迎的吗？”^①

在郭沫若的回忆中，这些话是出于后来成为著名三角恋爱小说家的张资平之口，看得出来，这些其实也是郭沫若的看法。

2 | 其时，郭沫若刚刚升入九州帝国大学，由冈山转到福冈，谈话的地点是在箱崎海岸，即不久之后将引发郭沫若澎湃诗情的地方。而这次谈话之所以会给郭沫若“留下了很深刻的印痕”，甚至“永远留在记忆里”，是因为一个想法、一项策划已经在这次谈话中提出：

“其实我早就在这样想，我们找几个人来出一种纯粹的文学杂志，采取同人杂志的形式，专门收集文学上的作品。”^②

就因为有了这样的想法和“找人”的策划，郭沫若将这番谈话称为创造社的“受胎期”。由于“数来数去可以作为文学上的同人的还只有4个人，便是郁达夫、张资平、成仿吾和郭沫若”，于是约定以郭沫若“为中心”，“待学校开课以后，征求仿吾和达夫的意见，再策进行”。

① ② 郭沫若《创造十年》，《学生时代》3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创造社的“受胎期”,“社”并没有被提起,两位策划人关注的只是杂志。或许,在他们看来,有了杂志才有“社”,杂志是“社”的凝聚力之所在,杂志是“社”的形象的体现,杂志是使“社”立足于中国文化界的惟一方式,杂志几乎就是“社”的一切。

杂志不惟对于未来的创造社如此重要,对于“五四”时期其他社团及作者群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在那个年代,出一份杂志可以被想成很容易的事,不需什么部门批准,不需刊号什么的。“我想就只有四个人,同人杂志也是可以出的。我们每个人从每月的官费里面抽出四五块钱来,不是便可以做印费吗?”^①但以后的事实说明,几个没有背景、又缺少资金的留学生想出一份杂志并不那么容易。

如此关注杂志还因为他们都开始了写作,而“发表”已经成为很迫切又很困难的事。张资平回忆说:“当时我们的发表欲都很强,也写了些文章,但无刊物可以发表。”他又说:“我那时候已经进了丙辰学社(即中华学艺社前身),因劝郭也加进去,有文章可在《学艺季刊》^②发表。但郭不愿即时加入。”^③不愿加入的原因可能是不怎么瞧得起这个“学社”和这份刊物,连加入了“丙辰”的张资平也认为《学艺季刊》“和《新青年》比较起来又太专门,太复杂了”^④,也可能是与

3

① 郭沫若《创造十年》,《学生时代》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② 1916年12月由留日学生陈启修、王兆荣、周昌寿等发起成立丙辰学社,1917年4月创办《学艺季刊》,自2卷4期改为月刊。该刊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政治、外交、法律、经济及自然科学等诸多方面,尤为注重介绍和宣传科学知识,至1958年停刊(1937—1947曾一度停刊),是我国现代坚持时间最长的杂志之一。

③ 张资平《晒新期的创造社》,《现代》3卷2期,1933年6月。

④ 郭沫若《创造十年》,《学生时代》38页。

其加入人家的“社”，还不如自己挑头另组“社”。

2. 投稿遭拒的经历

4 | 此时的郭沫若已经有过投稿遭拒的经历。1917年底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前，他“为面包问题所迫”，曾打算向他当时正迷恋着的“精神上的先生太戈儿”求点“物质的帮助”。他后来回忆：“我把他的《新月集》、《园丁集》、《曷檀伽里》三部诗集来选了一部《太戈儿诗选》，想寄回上海来卖点钱。但是那时的太戈儿在我们中国还不吃香，我写信去问商务印书馆，商务不要。我又写信去问中华书局，中华也不要。”^① 郭沫若写下这番回忆是在1922年泰戈尔来华前夕，这时他已经从一个普通的留日学生成为“五四”新文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5年的时间过去了，但他仍然无法遏制自己愤愤不平的倾诉：“啊，竟终是我自己的堕落，我和太戈儿的精神的连络从此便遭了打击。我觉得：他是一个贵族的圣人，我是一个平庸的贱子；他住的是一个世界，我住的是另一个世界。以我这样的人要想侵入他的世界里去要算是僭分了。”^②

这番愤愤不平不仅是对泰戈尔的，更是针对当时国内两大书局——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

大书局的架子，郭沫若在他漫长写作生涯的第一次投稿时便领教

① ② 郭沫若《太戈儿来华的我见》，《文艺论集》14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